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高校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社团

建设与引导



◎王传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课题项目

高校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社团 建设与引导

◎王传利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校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社团建设与引导 / 王传利
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5014 - 4642 - 1

I. ①高… II. ①王… III. ①高等学校 - 马克思主义
- 学生团体 - 研究 - 中国 IV. ①A81②G645.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5792 号

高校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社团建设与引导

著 者/ 王传利
责任编辑/ 刘一民
封面设计/ 董 睿
技术设计/ 祝燕君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52173000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网 址/ www.qzcbbs.com
信 箱/ qzs@qzcbb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880 × 1230 毫米 32 开 11.5 印张 304 千字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14 - 4642 - 1 / A · 9

定价:30.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摇篮

——五四时期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社团的影响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4
第三节 在暴风骤雨般的社会运动中锻炼	10
第四节 在思想交锋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18
第五节 结论与启示	24

第二章 高校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社团的兴起

第一节 时代的产物	27
第二节 大学生个体发展的需求	36
第三节 党和政府的推动作用	42
第四节 高校党团组织的支持配合	51
第五节 发展阶段	60
第六节 发展特点	69

第三章 高校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社团的顾问

第一节 顾问的构成	74
第二节 顾问与社团的紧密程度	80
第三节 顾问的素养与工作内容	83
第四节 启示与建议	87

第四章 高校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社团的运行

第一节 申请成立	90
第二节 组织结构	95
第三节 活动管理	106

第四节	奖惩机制	115
第五章	高校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社团经费研究	121
第一节	大多数社团资金不充裕	122
第二节	经费不宽裕的原因	129
第三节	经费不宽裕对社团的影响	137
第四节	资金运作比较规范,少数社团账目混乱	146
第五节	政策建议:加强经费管理,适度增加经费	153
第六章	高校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社团规模研究	163
第一节	规模具有模糊性	164
第二节	分布的不均衡性	171
第三节	规模概算	194
第七章	高校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社团的活动及其功能	206
第一节	活动内容基本相同	208
第二节	日常理论学习: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	218
第三节	开展“三进”活动:提高思想品德修养	233
第四节	组织专题活动:优化校园育人环境	243
第五节	参加社会实践:服务社会,认识国情	254
第六节	创办网站、刊物: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	266
第七节	注重社团交流:加强骨干成员的选拔和培养	276
第八节	学习与实践: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283
第八章	高校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社团存在的问题及其 政策建议	296
第一节	存在的问题	297
第二节	发挥党团组织功能	316
第三节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323
第四节	选拔、培养和使用社团骨干	328
第五节	完善制度,健全管理	336
第六节	进行全面规划,提高活动水平	351
参考文献		359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摇篮

——五四时期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社团的影响

本章提要:五四运动时期诞生的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社团,是一个读书的场所、参与社会实践的纽带、思想交锋的阵地,执行着培育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通过理论上的探求和社会实践,相当多的社团成员成为共产主义战士。不少中共领导人和著名活动家,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往往在青年学生时代积极参加、组织过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社团。必须从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百年大计的战略高度,研究当代高校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社团建设与引导的规律,帮助更多的大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紧密地连在一起。一个基本的常识是: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条件。不过,肯定了这一判断,并不意味着停止了继续深化和具体化这一基本判断的研究。我们知道,准备思想和干部需要特定的载体,五四运动本身当然可以锻炼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五四运动确实使得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工人阶级巨大的推动历史的积极作

用,但是,五四运动是发生在五四时期的一场运动,持续的时间较短,在运动前和运动后,是什么载体执行着培育马克思主义者使命的呢?

五四时期是各种思潮相互碰撞的时期,许多感到中国危机的青年,不满军阀与列强相勾结统治中国的社会现状,纷纷结伴组社,成立了不少研究传播新思潮的团体。大浪淘沙,不同社会经历的青年,经过对各种思想的探索比较,各奔思想的归属地。当年的热血青年,一部分人倒向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客,一部分人没有直面阶级斗争的社会实践,失去了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和革命家的机会,仅仅成为共产主义的同路人和同情者。而也有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民主精神,并且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在急风骤雨的社会运动中锻炼,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基本事实:不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著名活动家,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往往在青年学生时代积极参加、组织过学生马克思主义社团。1918年4月,毛泽东在湖南组织的新民学会为人们所熟悉。不少新民学会会员为了人民的革命事业贡献出了生命,如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第五和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新民学会主要发起人的蔡和森;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张昆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的何叔衡;中国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第二、三、四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向警予;湖南总工会会长和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郭亮;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等。此外,还有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谢觉哉、蔡畅、李维汉等。1919年9月,周恩来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后来他本人成为新中国首任总理和外交部长,会员邓颖超也在20世纪70年代末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马骏、郭隆真在共产党员的岗位上英勇地牺牲了。1920年3月,李大钊发起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发起人是十九人,从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共产党员邓中夏、何孟雄等。

最早参加觉悟社的邓颖超曾经回忆说:“在五四那年的夏末,

我们男女同学中比较进步的积极分子二十多人,感觉需要一个比学联的组织更严密一点的团体,更能作一些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就组织了个小团体——‘觉悟社’。……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只听说最理想的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知道有列宁,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了;只知道他们的革命是把多数被压迫者解放了,要实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引起了我们的同情和对十月革命的憧憬。……在1920年有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共产主义青年团),1921年有了中国共产党以后,我们二十多个社员中有半数以上的人先后加入了党或团。有的还成为党或团的某些地方组织的第一批成员之一。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1924年初成立的,后又成立了党的组织。这时我们已经明确的知道了什么是无产阶级,要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确定了我们的信仰和奋斗的目标是共产主义。”^①这段话表明,一群不满社会现状,接受了新思潮、积极追求进步的青年,并非天然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其中的一部分人,经过参加马克思主义社团活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最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里。李维汉在1978年12月22日回忆说:学会成立之初,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向上”、“互助”的团体,会员们绝大多数是青年人,都抱着要革新、求进步的热烈愿望。但是对于怎样革新、如何进步,尚在摸索中,并不明确。但是,新民学会“成员们胸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抱负,研究和探索革命的真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跟随着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先锋毛泽东不断前进,而成为共产主义的忠贞战士”^②。

为什么那么多经历五四运动洗礼的青年人,由普通爱国者发展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同辈人中脱颖而出?这与他们参加

① 邓颖超:《五四运动的回忆》,载《中国妇女》1959年第9期。

② 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见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33页。

马克思主义社团的活动是什么关系？我们以新民学会、觉悟社、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例，研究这一富有吸引力的话题。

第二节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参加马克思主义社团的社员几乎都是学生。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一共十九名，全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中说，新民学会的发起人“都是长沙学校毕业或者肄业的学生”，^①是湖南一师的学生或者刚刚毕业不久且与一师学生有密切关系的青年。觉悟社最初社员约二十个，“都是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负责人员和工作人员”，十位男青年当中，七位是南开中学或者南开大学的学生，一位是高等工业学校的学生，一个是师范的学生；十位女青年是女子师范的毕业生或者学生。而读书是学生的天职。

五四运动前后，各种新旧思潮涌动。长期以来，中国没有对外交流的习惯。但是，甲午一役，举国皆惊：小日本竟然把装备相当的北洋水师打得落花流水！一些中国人不得不反思封建帝制的弊端，带着惊异的目光，接触到外部世界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新观点。介绍西方观点的书刊对于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纷至沓来的新思潮，同学们应接不暇，热望通过学习，掌握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理想与现实相去甚远，即使辛亥革命后成立了民国，挂出了共和国的招牌，宣布实行了所谓的议会制、多党制、普选制，中国依然没有像许多人希望的那样走上繁荣富强之路。面对严酷的现实，一部分人绝望了，一部分人退缩了，还有一部分人继续探索，寻找新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青年学生的视野。

1918年4月17日，新民学会开正式成立大会，制定了会章。会章的第二条规定：本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

^① 转引自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74页。

宗旨。会员们相互激励,见面或者通信,往往是讨论交流思想学术。1920年5月8日,会员十二人为陈赞周、肖子暉等五人赴法在上海半淞公园开送别会,讨论了大致六大项事情,谈论读书学习占了很大比重,其中第二项是“学术研究”,大家“都觉会友少深切的研究,主张此后凡遇会友三人以上,即组织学术谈话会,交换知识,养成好学的风气”。第五项讨论的是“会友态度”,要求“宜努力求学。”还部署“巴黎等会友较多处,可组织学术谈话会,定期会集”。^① 在新民学会第二号会务报告里,记载了1921年1月1日至3日连开三天会议的情况,读书学习依然是讨论的重点,在确定了学会的共同目的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后,大家讨论了从何着手的问题,读书研究是一个重点。毛泽东报告巴黎会友研究学术的情况,并且提议要组织起来研究学术。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记载:“毛润之云:各种普通或者专门学术,当让会友去自由研究,现会中所特要研究者,必为会友所共同注意且觉为现在急需的。主张单研究主义,如社会主义、实验主义等。陈启民主张规定一个计划,在本年内研究几个主义,定期得到结果。毛润之主张暂作半年预算,研究五六个主义。何叔衡君主张每月聚会一次,研究有得的可来谈,其余的可来听。彭荫柏谓社会主义、哲学、文学、政治、经济,皆有研究的必要,不赞成专研究主义。毛润之申明云:所谓研究主义是研究哲学上文学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各种学术的主义,当然没有另外的主义。”^② 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会员们关于读书的感受与计划。1921年1月16日是长沙会友常会期,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何叔衡说“不忘看书研究”,还要学习日文。周淳元目的在研究学术,正在进行的是学习英文。张泉山说“对于学问,想从数学、物理学、化学下手。现在有闲就读英文”。陶斯咏说“精神如鱼,学问是水,有学问精神才

① 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80页。

② 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88~589页。

得愉快”。^①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新民学会的会员是把读书研究当成重要活动项目的。

罗章龙对毛泽东和新民学会回忆说:毛泽东“博览群书,有些书他还可以背诵。他批判地吸收了中国古代思想,这在以后的毛主席著作中可以反映出来。后来,他读了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如达尔文、卢骚、斯宾塞尔、孟德斯鸠诸人著作,又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十月革命以后,又阅览了马列著作,接受了无产阶级共产主义思想。所以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东同志已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了”。“在新民学会阶段,当时围绕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題,探讨、研究了思想方面和实践方面的许多问题,有时为了弄清一个问题,讨论竟达一百五十次之多。”^②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新民学会对中国的事情和命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会员“人数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很认真的人,不屑于议论琐事。……认为时局是如此危机,求知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我的朋友们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本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和那时的大多数青年一样,毛泽东喜欢读《新青年》,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毛泽东在长沙师范学校几年,总共约花了一百六十块钱,其中包括许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大概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订阅费每月约一元。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毛泽东青年时代曾经两次进北京。他说:就是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

① 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88、589、606页。

② 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见方建文、张鸣主编:《百年春秋——20世纪大事名人自述》第一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436页。

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①

与新民学会一样，天津的觉悟社也把读书学习当成重要活动内容。觉悟社在1919年9月16日正式成立，宗旨被概括为“介绍社外人的言论——著作同演讲”、“灌输世界新思潮”等。社员李震瀛以笔名“二八”在《觉悟》第一期上发表《三个半月的“觉悟社”》，其中记载了成立大会后的第五天，即9月21日，“李大钊先生来天津，就由交际委员请到本社谈话”，李大钊给予觉悟社许多建议。23日，“讨论了几件关于小册子事情同研究学术的方法。又有北京来的蒋梦麟、罗家伦、孙几伊三先生到本社谈话”。26日，“本社请刘半农先生同社员谈‘白话诗’”。在半个月里，高频率地请到三场报告或者谈话。通过与名人名家交流，大家发现知识的欠缺，“感想到除非共同研究问题，不足以引起兴味。”到了11月，社员加大学习的力度，11月17日，“分组讨论，讨论‘共同生活’。大家的精神非常愉快。”“20日有两组分着讨论‘工读主义’同‘家庭改造’两个问题。”22日全体社员会议，共同讨论前两次的话题。“自这天以后，分组的讨论天天都有，社员相互渐渐的了解。问题的讨论，可以算进步最速的时期。”^②

1957年5月，邓颖超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五四’时，我们对各种思潮的内容知道很少”，“我们吸收新知识，只能看《新青年》、《少年中国》等杂志”。“在当时我们还不能称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只能说从那时起我们这些人，要求继续学习，吸取新知识。党成立后，我们受党的宣传和影响，思想逐渐成熟，终于参加

① [美]斯诺：《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版，第35、37、38、45页。

② 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08、309、310、311页。

了党,成为共产主义战士。”^①

即使被逮捕入狱,觉悟社的成员依然坚持读书研究。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领导天津学生运动被捕入狱,留下了《警厅拘留记》和《警厅日录》,记载了坚持斗争、学习的情景。4月16日,“公举马千里、于兰渚、周恩来三人,办理读书团的事。课程的内容,分英文,历史,数学,中文,数部分。时间每日下午2点至5点,每门功课占三十分钟。”“规定每日起居工作时间:早8钟起,8钟半运动,上午预备受检厅开庭讯问,下午2钟至5钟读书,7钟至9钟研究社会问题,9至11娱乐会,12钟前就寝。”5月14日,“议决讲演会世界工业革命史讲完后,由周恩来介绍马克思学说。”5月28日,“晚间全体会,……先开讲演会: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5月30日,“晚上全体会,讲演会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6月2日,“晚上聚会,讲演会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6月4日,“晚间聚会,时子周主席,先开讲演会,仍由周恩来续讲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6月7日,“晚上会议,夏琴西主席,先开讲演会,周恩来续讲马克思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本集中说’,今天马氏学说已经讲完了。”^②把监狱当做学校,刻苦学习的精神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由大学生组织的,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水平较高。它在1920年已经组织起来,只是没有公开而已。开始是利用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来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书,分别阅读。不懂外文的,则请通晓外文者帮助他们。因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于是在1921年11月17日正式登报宣布成立马克思主

① 邓颖超:《回忆天津“觉悟社”等情况》,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233页。

② 转引自方建文、张鸣主编:《百年春秋——20世纪大事名人自述》第一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332、333、334页。

义研究会。发起启事说：“本会叫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底会员。”具体的研究的范围极其广泛，除了马克思的学说以外，还研究当时国内外的重大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和各派社会主义，并就有关问题组织讨论。1922年2月2日的通告，则规定了学习和研究方法：每星期六晚七时开一次讨论会，“先由会员一人述释该题之内容及其要点，然后付之讨论。一次讨论不完，下次续之”。研究会成立了三个特别研究小组：一是劳动运动研究，由几个感觉此项知识之需要的会员组成，每星期三晚集会一次。二是《共产党宣言》研究，由几个感觉英文程度颇佳的会员组成，采此书为教本，每星期一、四、五请会员一人教授之。三是远东问题研究，材料分三种搜集，英文的、日文的、中文的。还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社会主义史、俄国革命及其建设、无产阶级专政及马克思预定共产主义完成的三个时期等十一个固定研究组。为了帮助研究，该会集资专门组建了图书馆。据1922年2月6日的研究会通告说：“本会现已有英文书籍40余种，中文书籍20余种。”^①图书量增加很快，4月24日研究会图书馆发布的第二号通告里说：“本会新到英文书籍70余种、杂志10余种并德文书籍杂志七八十种。”^②这仅仅是一次新添的图书资料。在当时来说，拥有这些资料算是相当丰富的了，会员们争相阅读。研究会的活动十分频繁，他们利用一些纪念日开展活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马克思诞生104周年纪念日，研究会发布了通告：“5月5日（星期五）是马克思诞生百又四周纪念日。本会定于是日下午1时在北大第三院（北河沿）大礼堂进行纪念大会，并请李大钊、顾孟余、陈启修、高一涵先生讲演。此

① 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78页。

② 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84页。

会系公开性质,无论何人均一律欢迎。特此谨告。”^①1923年该会又为德国的无产阶级战士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牺牲四周年召开了纪念会。

那时参加马克思主义社团的学生,几乎都是思想进步、立志报国的青年。为了寻求疗治国家的良方,社员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西方社会政治方面的书籍,不少社员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在比较推求中,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无穷魅力,从而信仰马克思主义。

第三节 在暴风骤雨般的社会运动中锻炼

在五四前后,参加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社团的青年人是很多的,有相当多的青年学生追求进步,但并非全部参加者都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成员刚加入马克思主义社团时,基本上都是热血青年,但是,时代的大浪淘沙,思想分化严重。邓颖超在1949年回忆觉悟社时说:“‘觉悟社’的二十几个社员,三十年来,变化很大。有的人早作了革命的逃兵,有的人只图个人安逸已不问政治。有的人已堕落到反动的国民党营垒中去了。但是有的人一直坚持革命,奋斗到现在。有的人是站在光荣的共产党员的岗位上英勇牺牲了。”^②在新民学会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有些新民学会会员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领导人,甚至贡献出生命;有的仅仅成为共产主义的同路人。李维汉说:“新民学会建立于五四运动前,活跃在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中,它的成员们胸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抱负,研究和探索革命的真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跟着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先锋毛泽东不断前进,而成为共产主义的忠贞战士;有些人在这面伟大旗帜的

① 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84页。

② 邓颖超:《回忆天津“觉悟社”等情况》,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3页。

影响下,成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少数人则走向这面旗帜的反面,被革命风暴抛入浪底,成为沉渣。”^①

我们不去探究堕落者与共产主义战士形成的路径,二者的区别容易掌握。我们要研究的是,当初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社团的成员,为什么有些人成为共产主义战士,而有些人仅仅成为共产主义的同路人或者同情者。共产主义的同路人或者同情者不是反动分子,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研究工作作出了一定贡献,或者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成为专家,为人民、民族作出了有益的工作,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他们毕竟没有成为中国进步的主导和主流,没有能够在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历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失去了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机会。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李达比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李达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是专家,但是,由于身体条件以及不满陈独秀的专断,只能够拿起笔杆子,只能研究、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②耽误了继续站在革命斗争最前沿,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机会,没有能够像毛泽东、周恩来那样成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为什么出现这种结果?当然,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原因,关键是能否始终如一地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能否积极投身到急风骤雨般的社会大变革中去。那批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马克思主义社团的成员,往往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往往义无反顾地融入轰轰烈烈的社会大变革中去了。

应当说,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社团,为大家在青年时期提供了参加社会斗争、与人民群众相结合、锻炼意志、成长才干的舞台。凡是后来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社团成员都十分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注意在社会的大风大浪中成长。

^① 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33页。

^② 参见王会悟:《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7页。

较之北京大学的教授、大学生,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不算早,理论准备并不是最充分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开会时,毛泽东留给张国焘的印象是“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而王尽美、邓恩铭在张国焘的眼里仅仅是“向到会代表们请教”的刚刚毕业的中学生而已。但是,毛泽东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站在时代潮头,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这与他在新民学会中确立的理论联系实际,注意在社会大风大浪中的锻炼是分不开的。罗章龙在1979年回忆新民学会时说,学会有一个重要的活动是参加革命实践。毛泽东有一个特殊的爱好,读书之外,很少坐着不动,总是到外面走一走。“他提倡步行,并要求新民主学会会员也不要坐人力车”,“在长沙,我陪毛主席到过许多地方”。毛泽东常领着大家去的地方有禹王碑、楚国屈原的故居、汉朝贾太傅祠、杜甫流浪住过的岳麓山上的崇德寺、南宋文学家和将军辛弃疾长沙练兵的飞虎营、王夫之的家乡,还有许多古战场等。毛泽东对罗章龙说:我们这样走是有意义的,我们要像前代革命英雄人物学习,使自己的思想丰富、意志坚强起来。毛泽东带领大家这样做,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为了锻炼身体,向古代、前辈的英雄学习,吸取经验教训。毛泽东还带领大家游学,同样,毛泽东也是把这个活动赋予社会实践意义。他认为,游学可以求得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到社会大学中读书,同时可以搞社会调查,了解农村情况,还可以访问朋友,发现志同道合的青年。

在处理读书与社会实践关系上,新民学会主张读书要与实践需要结合起来。毛泽东不反对出国学习,主张会员应该到世界各地考察,曾经组织新民学会的会员赴法勤工俭学,送走不少会员。毛泽东也获得了公费的资格,但是毛泽东觉得国内还有大量的实际工作需要人留下来做,就把公费名额给了别人。他尤其强调:“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①

^① 毛泽东:《致周世钊》,1920年3月14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